

【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孙子学史研究专题

顾福棠：首开 20 世纪以新理念诠释 《孙子兵法》之先河

邵 青

(国防大学 政治学院, 上海 200433)

摘 要: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军事学的进入和传播是近代中国国门洞开和被动变革的必然结果。面对西方军事学的潮水般涌入,如何处理西方军事学术与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原有军事学术的关系,是需要近代先驱们回答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不仅涉及对待《孙子兵法》的态度,更体现了对待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是全盘继承还是批判继承,是全盘西化还是以我为主?这不仅仅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关系到道路和方向的大问题。顾福棠是 20 世纪以新理念、新视角、新方法解释《孙子兵法》的第一人,他从古代用兵之法与今日用兵之术的结合、自我突破与学术自信的结合、中国“兵学之体”与西方“兵学之用”的结合、“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结合、内容“厚今”与形式“师古”的结合等五个方面为《孙子兵法》诠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范式,不仅为 20 世纪孙子兵学的发展突破开启了新局面,而且为恢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信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关键词:《孙子兵法》;顾福棠;学术自信;军事学术;传统文化

中图分类号: E 892 **文献标识码:** A **DOI:** 10.13486/j.cnki.1673-2618.2023.01.004

顾福棠,字咏植,原名成章,江苏武进人,是清末具有爱国之志的学者、诗人。他于 1900 年(光绪庚子年)编撰出版《孙子集解》一书,全书共十三卷二册,是清末时期重要的《孙子兵法》注本。书名“集解”,但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只集中国历代各注家之注解,而是汇集了古今中外兵学理论、科技装备、军事训练、组织编制、战史战例、军事外交等大量资料,并且突出服务实践需要这一目标指向。顾福棠具有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且能够打破传统文化的局限,他认为坚持“以我为主、兼容并蓄”是弘扬以《孙子兵法》为代表的中国优秀传统兵学文化的正确选择。通观《孙子集解》全书,可知他在注释《孙子兵法》上主要实现了五个“结合”。

一、古代用兵之法与今日用兵之术的结合

顾福棠编撰出版此书的目的十分明确,即希望能够“有裨于今之武备”^{[1]158}。在其序言中,顾氏通过对富国与强军的关系的阐述,表达其编撰此书之意图,认为面对强敌环伺,当务之急是先强兵御敌,待实现国家安定与安全,然后再图富国之长计。

顾福棠在书中首先探讨了富国与强兵二者孰先孰后的问题。针对国家既贫且弱的现状,如何尽快改变落后面貌,实现国家的富强是许多爱国志士苦苦思索和探讨的问题,有人迫切希望改变现状,要求同时推进富国与强兵,希望二者并

收稿日期:2022-12-24

作者简介:邵青(1972—),女,山东梁山人,教授,军事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军事思想与军事历史、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中国化、党的创新理论与实践等研究。E-mail:13501844850@163.com

重,也有的希望先富国后强兵。对此,顾福棠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二者有先有后,同时推进是不切实际的,面对当时国家面临的严峻形势,首先应当求强兵之策,也就是说强兵应在先,富国当在后,因为“非强兵无以立国,无以卫商,无以操自主之权,无以禁外泄之利,既无以致富而保富”^{[1]157}。因此,要实现强兵御虏,就必须刻不容缓地讲求用兵之法与用兵之术。

顾福棠于1900年出版该书时,时任浙江巡抚恽祖翼特为该书作序指出,清军在抗击外侮时屡屡失败,有将其原因归之于船不坚炮不利者,这是不务本而务末,而认为“我之兵御外侮不足平内乱有余”^{[1]155}者,则为隔靴搔痒,未切中要害。关于晚清军队战力不行的原因,恽祖翼则认为,其根源在于军中沉痾习蓄,军制不严,军纪败坏,即兵学不兴。顾氏对此表示赞同,他亦认为,其地其器今昔不同,而用兵之法则无不同。他强调,今日之世界,海上形势严峻,各国都重视海上争雄称霸,国家要想屹立于五大洲之上,不仅要有坚船利炮,而且还要熟谙海上作战方可,“今天下海氛厉矣,非挟船坚持炮利不能擅大洋之长,非习风涛沙线不能捷大洋之战立五大洲之上”,所谓“雄莫雄于今,精莫精于今,诚从古未有之创局”^{[1]157},这无论如何是前人所不能预料到的。但是他并未简单地认为因此以往旧有的兵学就无用了,而是深刻指出,虽然时代不同,武器技术装备今昔有别,但是“原用兵之法与用兵之术则无不同”^{[1]157}。因此,要对军队从根本上补救之儆戒之涤荡之,就必须运用优秀传统兵学文化之智慧,尤其是首推《孙子兵法》。

在顾福棠看来,遍览古今中外各兵书,对于用兵之法与用兵之术诠释得最好的莫过于《孙子兵法》。其原因在于:一是《孙子兵法》一书为诸兵书中尚奇变之冠者。他指出:“中国之兵书富矣,三代以上者类多,论名其最确者莫如孙吴,然孙吴虽并称而吴之书繁略不中,无所统纪,不若武之书言约而意博,始于计而终于反间,接之以形势,纬之以火攻,奇权秘算悉举天下古今之兵说包括于其中,此诚千古兵家之祖,兵家之师也”^{[1]157}。二是与其他兵书相比较,《孙子兵法》一书亦为辞简意周之冠。“夫孙吴司马本兵家所必读之书,而孙子为尤最其辞简其意周”^{[1]157}。

三是孙子所处世当春秋之末战国之先,“亦与今之世大略相同”^{[1]158},适宜于为今人提供可资学习借鉴的智慧。另外,顾福棠在《孙子集解》序言中着重指出,日本人十分重视《孙子兵法》的学习。在日本,关于孙子研究的兵书有数百家之多,作为《孙子兵法》的母国,更有学习并汲取御侮之道的必要。即如“海外之人犹且尊之信之习其说以行其计,而况吾国家功令所颁之武经,能不汲汲焉诵而习之、沉思积虑以藉为御侮之资哉?”^{[1]158}但需要指出的是,顾福棠在全书中对日本注家及涉及日本战例一概不引,这也从一个侧面表露了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士人对日本的憎恶之感。

二、自我突破与学术自信的结合

顾福棠本为旧式学者,曾编有《武进苔岑社丛编》,并曾与晚清著名文学家、经学家、古文字学家俞樾有书信往来,就古文词义考据进行考辨^[2]。但在本书中,却看不到多少顾氏旧文人的痕迹,完全没有斤斤于考据校勘,通篇充斥的都是近代西学之用,渗透的是其服从战争之需的忧患意识和迫切感。即便是对以往注家注释之质疑,他亦均以是否对御侮战争实践有用为出发点,这实属难能可贵。可以说,这是自古以来经世致用士大夫精神的传承,体现的是一种责任感,又是自我革命的一个过程。即以国家需要为出发点,从皓首穷经中抬起头来,睁眼看世界。在坚定文化自信的同时,勇于突破自我原有局限,积极学习了解西方历史、文化、科技,汲取其有价值部分为我所用。可以说,这是一种另类的“自我革命”。

除了顾福棠以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学者能够打破旧学之禁锢,向西方学习。如顾福棠在书中引用同时代爱国志士周郁雨为抗侮御敌而作的《新法炮台议》一书关于炮台炮位的设置、设击的角度等科学研究成果,由此进一步说明孙子兵法原则与近代技战术有效结合,能起到抗击外侮之重要作用。周郁雨为同治九年(1870)举人,年轻时初习训诂音韵之学,为俞樾所欣赏。后感于时局需要,转而研习西学,对物理、化学、医药、机电、矿冶、火器制造等无所不通,洋务运动时被聘为江南广方言馆翻译,其间,又认真研究洋务、介

绍西方近代先进科学。在他看来,学习知识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为此,他专门作《治原策》与《富强策》。因为注意到中国沿海隘口炮台之拙陋、炮位又少,一旦敌人炮舰过来难以应对,周郁雨于是专门著《新法炮台议》一书以备御敌之用。

顾福棠在其书中注释《孙子兵法》时,所引用外国战例以欧美近代战争史为主,尤其是拿破仑战争、美国南北战争、英法百年战争引用较多,足见其对欧美军事史之熟悉。同时,又充分表现出不盲信权威、坚持学术平等与学术自信的态度。他将自己与十家注各注家并列,往往在引前人注家“曰”之后即附以“福棠曰”,在诸注家后附自己的见解,对前人注,得者存,失者辨,间或对有的注家之注释提出质疑或反对,亦有多处不用其他注家注释,而是直接阐发自己的见解。使“福棠曰”与“诸家曰”完全平等,展示出其与前人注家平等的自信。当然需要指出的是,顾福棠在书中亦有多处注释属个人臆断,不乏偏颇之处。

三、中国“兵学之体”与西方“兵学之用”的结合

可以说,《孙子集解》是中体西用思想在兵学领域的表现,体现“中体西用”之原则,也可以说是《孙子兵法》版的“中体西用”。该书以《孙子兵法》为体,强调其原则不变,放之四海皆准,以西学为用,二者结合方能纾解国家之危困。他强调国人必须重视《孙子兵法》之学习运用。他用外国战例证明孙子原则没有过时,用外国技术弥补《孙子兵法》之不足,使之更与今日需要结合起来,认为有原则加上今日之技术就可以战胜外国。全书共采用了五种注释方式:一是“十家注+古例”,二是“十家注+古例+西例”,三是“十家注+顾注”,四是“十家注+顾注+西例”,五是“顾注+古例+西例”^①。所谓“集解”,除了集诸家注解,还包括自己的解释;除了集中国战史战例,还集外国战史战例;除了集古代战史战例,还集近代战史战例;所谓古今中外悉数涵盖进来。十三篇无一篇不引用中国古近代、西方战例战史或西方科学原理、军事技术等方面知识,旨在说明《孙子兵法》的原则并未过时,且中外通用,不仅适用于中国,而且适用于外国,不仅适用于过

去,而且适用于现在和将来。他强调我古已有之兵法与现代兵学、兵制、战争并无脱节,掌握其用兵之法与用兵之术,必有信心实现强兵御侮之目的。顾福棠在书中同时运用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知识及战史战例解释《孙子兵法》某一原理原则,体现了中西兵学理论与战史战例的有效结合、相互融合。如他注“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句,首先引杜佑注释及举例“言兵者凶器,久则生变。若智伯围赵,逾年不归,卒为襄子所擒,身死国分。故新序传曰:‘好战穷武,未有不亡者也’”。次引拿破仑恃强而黷武入深而不虞最后兵败亡国之例,进而得出两点启示:一曰战争中避免久而不下;二曰马上得天下,不能马上治天下,非危不战,而不能逞兵恃强。善始未能善终,所谓“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故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1]185-186}。顾福棠在注释过程中,不仅大量列举西方近代战史战例用以证明《孙子兵法》的原理原则,尤其注重将西方近代科技及兵器知识与《孙子兵法》原理相结合,多处用近代军事技术装备等来解释《孙子兵法》,如对“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的解释,先引张预注及史例,后以“福棠曰”引拿破仑经典战例证明,最后指出拿破仑善于用兵的特点无不与孙子原则相合,即“统观仑之用兵,邀击别将,然后反军攻城,潜军袭敌,更复塞敌援于途,遣将破敌,而复自将别出,无有不以正合以奇胜者也”^{[1]238}。

值得称道的是,顾氏将书中所引所有西人之史例事件发生时间全部换成我之朝代纪年,便于读者受众理解。如他注“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句,举英法百年战争期间,1347年英国围攻法国加来港之战,将1347年换成元顺帝至正七年七月。“元顺帝至正七年七月,英国攻法之加勒斯者,法之咽喉不能猝,拔乃筑长垒环围困之,复以一军绝其粮道,俟城中食尽乃降。”^{[1]210}这样,不仅便于国人理解,而且也体现文化自信和民族自觉意识,说明我之历史之连绵不息、从未中断。

四、“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结合

与列强相比,我是防御之一方,顾福棠从这

^① “古例”即中国古代史例、战例,“西例”即西方史例、战例,“顾注”即顾福棠本人注。

个实际出发,时时处处结合反侵略战争的实际需要对《孙子兵法》进行诠释。其中既有忠实于原文的阐释,也有多处联系抗敌御侮之实际需要进行阐发,重在表达自己的思想,提出自己新见解,尤其强调突出技术装备的极端重要性,甚至有时不惜改变文句原意,体现出“六经注我”的明显色彩,通过这种方式提出自己的强兵御敌之方。联系中国在与列强对抗时属于弱势一方,顾福棠在注释“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逃之”句时,指出要“能逃与避”,灵活善于变通,不能呆板僵化,“所谓能者诚实有万全之策略在也”。同时,他认为应当抓紧弥补不足。如关于“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句,顾福棠言明我与敌相较现在之长短以索后来胜负之情,即当下通过比较,发现不足,查缺补漏,方能在未来较量时获胜。联系我对敌战争准备之需,用意十分明显。另外,他尤其重视加强技术装备建设与运用,比较明显地体现为以下四点。

一是突出强调战前技术装备准备之极端重要性。如他注“千里馈粮则内外之费宾客之用胶漆之材车甲之奉日费千金然后十万之师举矣”句,强调“读此节经文可知粮饷器具物料非一一早备不可轻出师也”^{[1]183},并且强调战前准备要以兵器准备为首要。又如关于“其次伐兵”句,顾福棠联系上文,指出:“若不能败其成谋,绝其援助,则当犀利兵器以胜之”。他将此处“兵”释为“军中器械总名”,目的在于突出近代技术装备对于战争胜利的重要性。他还强调指出,炮台铁甲枪炮水雷日新月异,精益求精,“非一国所能悉造亦非一时所能猝办,若非备之于先,而一旦临危之势自造,则无人无料购办,于局外之国则或格于公法不能出售或又为敌船守其海口不能往来,势必至有备者猛厉无前,无备者血肉相抵”^{[1]203}。由此强调战前的技术装备的制造十分重要,即“伐兵一端诚今日之先着”^{[1]183}。再如关于攻城之准备,顾福棠一反孙子“攻城之法为不得已”之原意,而是联系实际指出近代作战攻城的必要性,强调攻城的准备时间要有所保证,攻城器具要齐备,所谓“修与具必须三月之久而后成,不久恐其器不精良不足用也”,“有此精良之器然后我之兵可以赴前敌”^{[1]205}。同时他还指出,攻城工

事工程的准备也需要三个月时间,即“然筑距堙又必历三月之久,不久恐四面所筑不齐,我之兵不能同时登城,仍不能操必胜之算也,故必约之曰三月”^{[1]206},强调孙子所提出的准备时间之必要与合理性。

二是指出应注重运用近代数学及工程技术加强战场建设。如关于“度量数称胜”部分,顾福棠完全跳出以往注家解释,认为“诸家之注均未得其旨”。他则认为“度量数称胜”五者皆为“实事求是之算法”。如关于“地生度”,他的观点是,“地”即用兵之地,其中有险夷、有高下、有广狭之分,“惟有度以作之,然后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度者丈尺之总名”^{[1]230}。他联系并运用西方近代军事工程测量学相关知识指出:“西人兵法每军之中必有工队,工队者主营垒桥道铁路炮台掘地开濠等事,因地险夷高下广狭之势以工队造作之,是即由地生度之谓也”。关于“度生量”,他亦以西人西法解释,指出:“西人自将弁及兵无不先学测量之法,工队之事既修,然后可以议进兵,议进兵必先测量夫敌之远近上下,是即由度生量之谓也”。“量生数”则为“测量定然后知彼我相离若干之数,数者算法之总名,所以知得失也,古之弓矢今之枪炮何以中,何以不中,当求其得中为度,是即由量生数之谓也”。“称生胜”意即“称者,权锤之柄,所以知轻重也,中不中,得失之数既定,然后用兵之孰轻孰重则我之胜算可以独操,是由称生胜之谓也”^{[1]231}。由上述其所释可以知,顾福棠将西方近代军事学、数学、科学技术知识融入注释之中,突出其现实指向性,创新性与时代性十分鲜明。

三是强调武器枪械使用要能因时因地制宜。如关于“阴阳寒暑时制”的解释,他援引近代德国有关操练洋枪之方法要求,指出打枪瞄准时要注意视线靶向与日光之间的早晚偏差,“眼光与日光相射则有偏,左偏右之不同,如向东之靶午前光正,向西之靶午后光正,日初出,光在南,枪必走北,日将入,光在北,枪必走南,惟日中时可打中”^{[1]162}。还有阴天晴天射击之差别,又因子弹的重量与风速、射击距离等而产生的风力差,如“哈契开斯枪子力大而劲足,风小尚不走线,风大亦可吹动,若五六百步远靶即风小亦有出入矣”,进而强调“今日用枪之法亦当因阴阳寒暑以各制

其宜也”^{[1]162-163}。

四是针对敌人火器威力大提出应对之策。如针对今日敌人武器皆为火器、威力极大的问题,他援引西方古代战例与今日最新技术、西方最古的火攻法与最新的火攻技术相结合,积极寻求克敌之计。这在《火攻篇》注释中表现得最为明显。顾福棠在该篇注释中重在联系实际发挥,运用了近代光学原理、算术学知识,强调我方若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必能胜敌。他指出,可运用火凹镜取太阳之火之光学原理,寻求销毁敌人炮舰的有效之术。他说:“按光学理算得光线使成有法之形,并再加工锻炼,则光既及远不散火亦甚为猛,尝用一寸厚二尺四寸见方之镜能于57丈外熔化五金。以此两次试验,用算法合之得知,积光10寸能及一丈之远,由此推之,若用一尺厚八尺见方之镜必能烧及30余里之远,则无论贼势若何大,贼艘何坚均不难立燬之而化为灰烬矣。”^{[1]408}

五、内容“厚今”与形式“师古”的结合

从以上分析可知,顾氏撰该书重在将新知识嫁接并融入旧兵学,就其内容来看,“厚今”的特色十分明显,但是综观全书,又可知其采取了“旧瓶装新酒”的方式,即行文风格与表现形式则是中规中矩,采取传统样式。体例还是旧式文内小字夹注形式,表述也是文言风格,其行文格式与历代注家相类似,全书首尾并无断句标注停顿之处。顾福棠在其前言中也明确说明,该书编纂主要是依据孙氏星衍所校十家注本,“剪其繁芜删其不切于经旨者而取其义之精者”^{[1]158},行文则宗颜师古注《汉书》体例,在每篇篇首对全文旨意进行概要介绍,十三篇每一篇之前都有“武进顾福棠原名成章”字样。这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该书不可避免会出现“吃力不讨好”的尴尬局面。一方面,本书研究与学术味较浓,若无一定的古文基础,或对《孙子兵法》不甚了解,读起来有一定难度,作为普及读本未免过于高深。另一

方面,书中援引外国战例及近代军事技术及学理较多,并且内涵也较为深刻,如对国外历史文化军事知识一无所知者,理解起来可能比较吃力,又不可避免地使传播范围受限。

因此,对于顾福棠《孙子集解》一书的兵学及实践价值,尽管恽祖翼评价甚高,指出作者“尤能寻原竟委阐发其微,集诸家之大成择要削繁融会经旨,此非特孙子一书之功臣,实千古用兵之龟鉴也,幸将士读之,其亦为水陆振作之一助乎!”^{[1]156} 初衷虽好,但是实际产生的影响及效果却甚微。另外,顾福棠毕竟作为书生言兵,虽然其书中有新意之解释较多,但望文生义、曲解臆断之处也多处可见。

当然,瑕不掩瑜,与1840年以来孙子兵学发展注重实践转化与孙子精神的化用不同,顾氏将孙子兵学转回到学术轨道上来,以旧的形式和新内容为近代孙子兵学发展打开了新的一扇窗,从而开启了近代孙子兵学发展的新途。

综上,《孙子集解》作为迄今所知近代以来、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兼用中西方军事理论与实践诠释《孙子兵法》的孙子兵学专著,对促进孙子兵学与近代西方兵学的沟通融合做出了开创性贡献。他从古代用兵之法与今日用兵之术的结合、自我突破与学术自信的结合、中国“兵学之体”与西方“兵学之用”的结合、“我注六经”与“六经注我”的结合、内容“厚今”与形式“师古”的结合等五个方面为《孙子兵法》诠释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研究范式,但顾氏作此书绝非简单从学理上以中西融合视角研究《孙子兵法》之书,而是为御侮抗敌所著,其中蕴含着不少御敌之新思路、新方法,既沟通古今,又连接中外,还使理论与实践结合,不仅使《孙子兵法》这一古兵书焕发出新生机,而且为孙子兵学发展注入新的活力。陈启天对此书高度评介指出:“其欲本新战国之眼光,以注释《孙子》,顾氏殆其先河欤!清代注释虽如此之多,然尚不能谓其于兵学有何大发明也。”^[3]

参考文献:

- [1]顾福棠. 孙子集成:19册[M]. 济南:齐鲁书社,1993.
- [2]陈启天. 孙子兵法考证[J]. 国论半月刊,1941(12).
- [3]俞樾. 与顾咏植明经[M]//俞樾. 春在园尺牍:七. 日本早稻田大学藏本.

Gu Futang: the Pioneer of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t of War* with New Concepts in the 20th Century

SHAO Qing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Opium War, the entry and dissemination of Western military science is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opening up and passive transformation of modern China. In the face of the overwhelming influx of Western military science, how to deal with the academic relationship between Western military science and China's original military science, represented by *The Art of War*, is an important question that needs to be answered by modern pioneers. This not only involves the attitude towards *The Art of War*, but also reflects the attitude towards traditional culture, whether it is a comprehensive inheritance or a critical inheritance, whether it is a comprehensive Westernization or a self-centered initiative. This is not only a simple academic issue, but also a major issue related to the path and direction. Gu Futang is the first person in the 20th century to interpret *The Art of War* with new ideas, perspectives and methods. He explores the combination of ancient military techniques and contemporary military techniques, self breakthrough and academic self confidence, Chinese "noumeno of military science" and Western "function of military science", "complete respect to the Six Classics" and "using the thought and wisdom in the Six Classics to interpret our own life" and "stress on the present" in the content and "learning from the past" in the form, and provides an unprecedented research paradigm for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t of War*, not only opening a new phas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un Tzu's military science in the 20th century, but also making a positive exploration for resuming the confidence in th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Keywords: *The Art of War*; Gu Futang; academic confidence; military academy; traditional culture

(责任编辑:许 金)